

# “将萎之花,惨于槁木”

## ——试探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

黄 开 国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成都 610068)

**摘要:**社会批判是龚自珍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衰世论则是龚自珍社会批判的出发点。龚自珍既有对衰世的揭露,也有对造成衰世根源的分析。龚自珍对衰世的揭露,重在从事实层面对统治阶层的无耻、无能、腐朽进行抨击;而对造成腐朽的根源的剖析,则从制度层面且与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联系起来。而人才是衰世论关注的焦点所在,但是龚自珍不清楚能够带来时代风云变幻的人才究竟是谁,所以,他的理想人才只能归结为“隐”而未露的“山中民”。

**关键词:**龚自珍;社会批判;衰世论;人才观

**中图分类号:**B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5-0111-06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面临着历史的千古巨变,整个社会处在“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sup>[1]449</sup>的沉闷之中,龚自珍以“受三千年史氏之书”的“智者”敏感,对当时的各种社会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衰世论是龚自珍社会批判的出发点。

### 一 衰世论

衰世论见于龚自珍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sup>[1]6</sup>

此时龚自珍还没有接受刘逢禄的《公羊》学,这里虽然谈到《春秋》,说到“三等之世”,但与《公羊》学的三世说无论条目还是内涵上都有所不同,而且《公羊》学以《春秋》为经,绝无论史以言《春秋》之说,因而龚自珍这里说的“三等之世”,决不是《公羊》学之说,更不是《公羊》学的三世说<sup>[1]6</sup>,而是龚自珍用来说明社会历史中治乱程度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从龚自珍关于三世的顺序来看,衰世显然较乱世还不如,

是三等之世中最为黑暗的时代: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官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一本“便便”作“平平”);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一议。……履霜之属,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痲之疾,殆于痲疽,将萎之花,惨于槁木。三代神圣,不忍薄谥。士勇夫,而厚豢弩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sup>[1]6-7</sup>

衰世表面上与治世相似,但是,却与治世根本不同。它所呈现的是一片凄凉的悲惨景象,犹如“履霜之属,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痲之疾,殆于痲疽,将萎之花,惨于槁木”。

这与龚自珍稍前所写的《尊隐》所描绘的“昏时”十分相近,“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sup>[1]87</sup>。《尊隐》将一岁、一日分为三时,昏时是一日的最后一时,“岁有三时,一曰

收稿日期:2008-10-20

作者简介:黄开国(1952—),男,四川大英人,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秦汉哲学、两汉及近代经学。

发时,二曰怒时,三曰威时”。三时与三世都是龚自珍用来说明事物、社会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衰世与“昏时”都是用来指代其衰败没落的阶段。衰世是龚自珍从历史发展来抨击当时的清王朝,“昏时”则是从日的不同变化来形容清王朝,二者角度不同,都是对清王朝行将没落的形象譬喻。《尊隐》与《乙丙之际著议》都著于他26岁之前的嘉庆年间,此时乾隆盛世的光景还记忆犹新,龚自珍就能以敏锐的眼光,看出衰世的即将降临,说明年轻的龚自珍已经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脉搏,洞悉了清王朝的没落命运。

龚自珍所说的衰世,是一个人才匮乏的时代,更是一个容不得人才的时代。《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说:

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泽无才盗,则非但黜君子也,抑小人甚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有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悻悻者蚤夜号以求乱。夫悻且悻,且眈然眈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向之伦聒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sup>[1]6-7</sup>

从卿相史祝到文人士子,从庶民工商到小偷强盗,从君子到小人,衰世都呈现出人才匮乏的景象。即使有一二人才出现,也会遭到千百个不才者的排挤压制,轻者束缚,重则戮杀。戮杀不是用刀锯、水火的明枪,而是用文名、声音笑貌的暗箭;戮杀的方式是不公开的暗中进行,手法是无所不用其极;戮杀不是身体的迫害,而是对心的摧残;戮杀不是一日、数年,而是十年、百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而,衰世不仅有人才匮乏的可悲,更有容不得人才的可怕。因而,龚自珍的“三等之世,皆观其才”,不仅是对衰世人才全面匮乏的哀叹,更是对衰世人才备受摧残的谴责。

在《尊隐》中,龚自珍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对“昏时”进行了论说:

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丑类窳眚,诈伪不材,是辇是任,是以为生资,则百宝咸怨,怨则反其野矣。贵人故家蒸尝之宗,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则窶人子篡之,则京师之气泄,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如是则京师贫,京师贫,则四山实矣。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不留京师,蒸尝之宗之[子]孙,见闻媿媿,则京师贱;贱,则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如是则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京师之日[苦]短,山中之日长矣。<sup>[1]87-88</sup>

以往圣贤精英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昏时”都遭到京师贵人故家的排挤,甚至裂磔;在人才方面,是丑类窳眚、诈伪不材之辈横行霸道,真正的人才却遭到排挤、裂磔。龚自珍这些关于“昏时”的描述,可与衰世的论说相互参考。《尊隐》较《乙丙之际著议》可贵的地方在于,后者从衰世论预言了大乱的将要到来,而前者从“昏时”的社会状况论及京师与“山中之民”两种力量的消长,而从“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鼯声,夜之漫漫,鸛旦不鸣”的“昏时”,隐约地看到“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sup>[1]88</sup>,预示了新兴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并必将取代京师权贵力量的光明前景。所以,《尊隐》较《乙丙之际著议》有更深广的价值,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还著诗对《尊隐》赞叹有加<sup>①</sup>,这决不是偶然的。

## 二 对衰世的揭露及其根源的剖析

龚自珍的衰世论,既有对衰世的揭露,也有对造成衰世根源的分析。他对衰世的揭露,重在统治阶层的无耻、无能、腐朽的抨击,对造成腐朽的根源的剖析,则与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联系起来。前者是从事实层面,后者则是从制度层面对衰世的剖析。龚自珍这两个层面的剖析,多是直接针对清王朝而发的。

关于统治阶层的无耻,龚自珍在《明良论二》中有两段极为精彩的论说:

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辞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

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岂真敬畏哉？问以大臣应如是乎？则其可耻之言曰：我辈只能如是而已。……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鸩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勉矣。<sup>[1]32</sup>

这一段话十分形象地描绘出了堂陛之官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以求受眷的无耻表情。在另一段话中，龚自珍则揭示了公卿大臣、政要之官无耻程度与仕途之间的比例关系：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sup>[1]31</sup>

做官时间越长、与皇帝的距离越近、猎取威望越高就越是无耻之极，无耻的程度与做官的长短、与皇帝距离的远近、威望的高低成正比。尤其可悲的是，这些公卿大臣、政要之官竟然用“只能如此”的无耻之言，来为自己的无耻行为作辩护。所以，龚自珍一方面哀叹古代大臣的巍然岸然、师傅的自处之风现在连梦都不可能梦到，另一方面又断定封疆一旦有缓急，这些公卿大臣、政要之官都只能纷纷作鸩燕逝，而根本不能为国家作一点贡献。

龚自珍将公卿大臣、政要之官的无耻，说成是臣节的丧失殆尽，这曲折地表明了龚自珍的这样一个观念：人臣应该有其独立的人格与气节。要求人臣的独立人格与气节，这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观念。他还进一步分析大臣政要无耻的原因，将其归罪于人君对大臣没有丝毫的礼敬：

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唐、宋盛时，大臣讲官，不辍赐坐、赐茶之举，从容乎便殿之下，因得讲论古道，儒硕兴起。及据（一本“据”作“其”）季也，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之余，无此事矣。<sup>[1]31</sup>

此处虽然没有明指清王朝，但是，从“朝见长跪、夕见长跪”来看，实指清王朝，是一目了然的。从龚自珍这段话所引的《礼记》与贾谊、郭隗之言来看，他只是借殿仪来论说正常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君主礼敬大臣的坐而论道，这样大臣才可以有正常的人格，保持廉耻之心，如果大臣对君主只是长跪敬拜，就只能导致人臣卑恭屈膝的无耻之行。

龚自珍从殿仪来分析造成大臣无耻的原因，看似比较肤浅。但是，“朝见长跪、夕见长跪”的形式，却是君主专制发展到极致在礼仪上的体现，这一礼仪背后的精神实质就是君主专制。所以，对此礼仪的批判已经包含着对君主专制的抨击，只是年轻的龚自珍还没有明确的表述出来。随着龚自珍思想的发展成熟，他40岁定稿的《古史钩沈论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明确地将君主专制视为造成天下之士无耻的根本原因：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一本“嵩”作“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胤孙乃不可长，乃诽，乃怨，乃责问，其臣乃辱。荣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诽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责问之始也。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籀其府焉，徘徊其钟簴焉，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殄、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暮乎？<sup>[1]20</sup>

所谓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正是君主专制的基本特征。君主专制所以要去人廉耻，是为了以快号令、崇高其身，即造成君主一人独尊、号令通行无阻的个人集权、个人专制。龚自珍在这里可贵的是将君主与整个天下之士对立起来，以为霸主“未尝不仇天下之士”，从而将君主专制造成的无耻由公卿大臣、政要之官推广到了整个“天下之士”。

龚自珍揭示君主专制是造成天下之士无耻的原因，目的不在于道德的评价，而重在揭示君主专制制度对人格的扭曲，对人才的扼杀。他对统治阶层无能的揭露更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明良论三》从清代官吏升迁的“用人论资格”，详细地论说了造成各级官吏因循守旧、不思作为的原因：

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翰林至荣之选也，然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学士。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夫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

已惫矣,虽有著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进;然而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惹,因退惹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僂然终日,不肯自请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才未尽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此办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原也。……其资浅者曰:我既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哉?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1〕<sup>33-34</sup>

按照清代的用人资格,一个人从进士出身到一品高官,无论贤智、愚不肖,一般都要到65岁,这在当时已经是齿发老、精神惫的老人。高官得来不易,所以无不碌碌无为,以保守为务。而刚踏入仕途的人,也只是静待以资格升迁,而绝无作为之心。龚自珍从“限以资格”的官吏升迁制度,来分析造成士大夫阶层毫无生气的原因,较之就事论事要高明得多,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这只是从一个方面对官僚集团无能的说明。

君主专制为了保障皇权的绝对权威,制定了许多条条框框,规定人臣必须无条件的遵循,龚自珍称这些条条框框为“不可破之例”。各级官吏与“不可破之例”之间,是主与奴的关系,例是主,官吏是奴,官吏只能照例行事,而不能对例有丝毫违背。《明良论四》认为,这种“不可破之例”所造成的各种约束、羁縻,所带来的对人身手脚的束缚,是造成官吏普遍无能的另一重要原因。“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1〕<sup>35</sup>。龚自珍借譬喻说,庖丁解牛、伯牙操琴、羿发羽、僚弄丸是“古之所谓神技”,但如果“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答汝,少一割亦答汝。韧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于山,而勿水之思也。矫羿之弓,捉僚之丸曰:东顾勿西逐,西顾勿东逐”,在这样的“例”制之下,四子也只能“皆病”而无所作为。龚自珍还借另一个譬喻来抨击“不可破之例”对人的束缚:“人有疥癣之疾,则终日抑搔之,其疮痍,则日夜抚摩之,犹惧未艾,手欲勿动不可得,而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1〕<sup>34</sup>在

“不可破之例”的约束、羁縻下,不仅使人无所作为,而且搞得官吏人心惶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担心因违例而带来的罚议,龚自珍形容说:

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部臣工于棕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大抵逆亿于所未然,而又绝不斟酌其所已然。其不罚不议者,例之所得行者,虽亦自有体要,然行之无大损大益。盛世所以期诸臣之意,果尽于是乎?恐后之有识者,谓率天下之大臣群臣,而责之以吏胥之行也。一越乎是,则议处之,察议之,官司之命,且倒悬于吏胥之手。彼上下其手,以处夫群臣之不合乎吏胥者,以为例如是,则虽天子之尊,不能与易,而群臣果相戒以勿为官司之所为矣。〔1〕<sup>35</sup>

龚自珍哀叹,在这样的“例”制下,即使“圣如仲尼,才如管夷吾,直如史鱼,忠如诸葛亮,犹不能以一日善其所为,而况以本无性情、本无学术之侪辈耶”〔1〕<sup>35</sup>。龚自珍所说的“不可破之例”,包括君主专制的各种制度,因而“限以资格”只是从官吏升迁制度来讨论官吏无能,“不可破之例”则是从整个君主专制制度来追究官僚集团无能的根源,这就更加深刻、激烈。

这种“不可破之例”,不仅约束、羁縻已经入仕的官吏,而且也是士子入仕的标准。龚自珍的《干禄新书》,带有讽刺意味的对殿试选士进行了抨击。易宗夔在《新世说》卷2认为,龚自珍著作此书是为了发泄自己不能入翰林之气:

龚瑟人生平不善书,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贡士,改官部曹,则大忿恨,乃作《干禄新书》,以刺执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必艷然作色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我家妇女,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晚岁学佛。平居无事,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2〕<sup>155</sup>

不可否认,龚自珍的《干禄新书》有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但更多的是对清王朝科举选士标准的批判。故《自序》中再三申说,殿试取士注意的只是合于八股文的格式,文字书写的中楷法,卷面的整洁光鲜,而根本不看其是否有真才实学。他的《干禄新

书》也全是以“论磨墨膏笔之法”等为内容<sup>[1]237-238</sup>，这实际上是从选士标准对“不可破之例”的批判。这种以照八股文格式、文字楷法、卷面整洁光鲜为“不可破之例”所选拔出来的官吏，不过是只会做表面文章的庸才。难怪他要讥讽他哪位“读五色书学问”的在官场洋洋得意的叔叔龚文恭公只知道：“红面者，搢绅；黄面者，京报；黑面者，禀帖；白面者，知会；兰面者，帐簿也”<sup>[2]100</sup>。而对这样的达官政要，他表现出无比的轻蔑。

对仅仅适合于科举与官场的书法，龚自珍也表现出十分的轻视。他论书家三等，就以其为下等：

书家有三等：一为通人之书，文章学问之光，书卷之味，郁郁于胸中，发于纸上，一生不作书则已，某日始作书，某日即当贤于古今书家者也，其上也。一为书家之书，以书家名，法度源流，备于古今，一切言书法者，吾不具论，其次也。一为当世馆阁之书，惟整齐是议，则临帖最妙。夫明窗净几，笔砚精良，专以临帖为事，天下之闲人也。吾难得此暇日。偶遇此日，甫三四行，自觉胸中有不忍负此一日之意，遂辍弗为，更寻他务，虽极琐碎，亦苦心耗神而后已，卒之相去几何？真天下之劳人，天下之薄福人也。<sup>[1]436-437</sup>

他以内外皆修，形神兼备，具有独创个性的书法，为上等的通人之书；以合于古今法度源流的书法，为书家之书；而将只适合于科举与官场的书法，贬斥为只知整齐是议的下等临帖。由此也可证明《干禄新书》对科举书法的讥讽绝不是所谓发泄，而是对科举标准的批判与否定。

君主专制除了在制度上约束、羁縻天下之士，还通过各种手段来腐蚀、箝制天下之士。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就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历代京师设立乐籍一事，揭露了君主专制在这方面的险恶用心：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于其京师及其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论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龚自珍论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议论者也。身心闲暇，保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留心古今而好议论，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

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师，以其人民众多，非一类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余户入乐籍。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掉阖以为术焉，则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sup>[1]117-118</sup>

历代君主在京师设立乐籍，并不是为了发展音乐文化，而是霸主用来箝塞、牢笼天下之游士的阴谋手段，目的是：“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第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奄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sup>[1]118</sup>使天下之士堕落于温柔乡，不思作为，成为无耻、无能之徒，以便君主专制之一己之私。

龚自珍的分析说明，君主专制是要把大臣政要为主的天下之士都变成无耻之徒、无能之辈，从人格而论，也就是成为丧失自我、依附皇权的扭曲人格。龚自珍指斥其这样的人格不过是缺少肝肠的畸形人格，他在大臣王鼎的家宴上赋诗说：“迩来士气少凌替，毋乃大官表师空趋跄；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杀人何必尽砒附？庸医至矣精消亡。”<sup>[1]499</sup>就是对君主专制下大臣政要人格的辛辣讽刺。他晚年所著的《病梅馆记》所说的“病梅”，实际是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社会人格丧失的写照：

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殒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桎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sup>[1]186</sup>

这里表面上是将病梅归罪于“文人画士之祸”，其实是借文人画士影射清王朝对整个社会人格的扭曲。龚自珍在揭露与抨击衰世时，都是从现实的感

受出发,针对清王朝而发。但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还让人记忆犹新,当时人们多是为讨生活而著书,像龚自珍这样有感于衰世而发出呐喊的人只是凤毛麟角。而文字狱的阴影使龚自珍在抨击清王朝时不得不有所顾虑,所以,他对清王朝的抨击多是通过譬喻的方式来进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也常常是借助批判历史上的“霸者”来表现。但是,只要结合龚自珍的其他思想,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认识,龚自珍对清王朝、君主专制的抨击批判还是令人一目了然的。

从龚自珍对衰世的揭露与抨击中可见,人才是他关注的焦点所在。清楚这一点,才可以了解龚自珍的其他思想。他以衰世对人才的摧残,对人格的

扭曲,而发出了“沈沈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sup>[1]467</sup>的哀叹。而龚自珍所说的人才,是未被摧残、扭曲,具有心肝、自我的独立人格人物。所以,他强调自我、心力的作用,要讲宥情、尊任,面对人才的匮乏,全社会的死气沉沉,他要在《己亥杂诗》的《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词万数道士乞撰青词》中发出对人才的强烈时代呼唤: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sup>[1]521</sup>

但是,龚自珍不清楚能够带来时代风云变幻的人才究竟是谁,所以,他的理想人才只能是“隐”士,是模糊的“山中民”,只能归结为“尊隐”<sup>②</sup>。

### 注释:

①该诗说:“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处到红裙。”见《龚自珍全集》第532页。

②关于龚自珍的“山中之民”究竟指的是谁,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97页认为,“肯定为农民阶级”。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则以为,应当是要求改变现状的地主阶级中的健康势力,也包括农民起义这部分力量。陈其泰在《公羊三世说与龚自珍的古代社会史观》(《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中认为,“山中之民”实际上应包括隐于野的有不满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数量众多的农民群众。胡思庸的《龚自珍思想论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则认为,“山中之民”决非农民阶级的代表,而是像龚自珍那样的封建士大夫的化身。1975年,《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认为,“山中之民”“事实上是包括隐在野而有反清思想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来自广大农民的会党群众”。陈铭《龚自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181页指出,这一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因为“龚自珍并无反‘圣清’的心态”,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是,陈铭《龚自珍评传》又认为,“从他的出身、经历、家世和全部思想出发寻绎,可以认为,‘山中之民’既包括宾宾说中的宾,也包括一些新的成分:这就是具有启蒙思想的反对派和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市民阶层,而这些人的集中代表,就是那个具有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具有启蒙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大多是有才能有抱负的人”,这就值得商榷了,因为连作者也认为“龚自珍当然不会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悄悄出现”,从龚自珍的思想中也根本看不到所谓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启蒙思想、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成分;至于《龚自珍评传》全书常常以资本主义萌芽的启蒙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近代民主主义性质的个性解放等来“论证”龚自珍的思想,则更是对龚自珍思想基本定位的严重偏差。

### 参考文献:

[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孙文光,王世芸.龚自珍研究资料集[G].合肥:黄山书社,1984.

[责任编辑:凌兴珍]